

社会转型与文学研究丛书

主编：高楠

西论中化 与 | 高楠 著 中国文论主体性

问题式求解，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所要求解问题从何而来，也就是说，这问题是谁的问题。相对于西论中化而言，中国学者从理论上提出问题，当然是他们生活其中的现实生活领域的问题，或者，是他们所在学科的问题，这类所在学科的问题，是这一学科在中国各方面情况综合作用下在学科活动及学科建设中表现出来的问题，这类问题具有确定的中国语境性。

问题的求解总是具有目的性的。不同求解者从他的给定的周围环境或语境中发现问题的重要性时便连同确认了解决问题的目的，即是说，问题重要性本身就包含着目的，它指向目的，并因这目的指向而显得重要。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社会转型与文学研究丛书

主编：高楠

西论中化 与 | 高楠 著 中国文论主体性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论中化与中国文论主体性/高楠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 - 7 - 5039 - 5150 - 3

I. ①西… II. ①高… III. ①西方国家—思想史—影响—文学理论—中国—现代 IV. ①B505②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7733 号

西论中化与中国文论主体性

(社会转型与文学研究丛书)

主 编 高 楠

著 者 高 楠

责任编辑 蔡宛若

装帧设计 李 鹏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84057660 (总编室)

(010) 84057691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5150 - 3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教育部“211工程”三期建设重点项目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学与文论

总序

高楠

中国正经历着文学与文论大规模建构的风暴，先前的一套稳定的模式，在质疑与批判中松动、解构、重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质疑与批判的主体力量，又恰恰是在先前稳定的模式中确定其学术基业的学者，他们是在进行着营垒中的反叛，他们揭竿而起。他们所质疑与解构的，恰恰是他们的学术本体。那么，他们何以进行这种近乎于自戕式的批判？在这个过程中，精英防线在作了一番艰难的守护中终于溃决；大众喧嚣不已的呼声经由当代传媒的鼓噪，发出大潮奔涌般的强力，把文学推上市场的旷野；文论面对大众文化带来的文学骤变，时而激愤，时而避闪，时而失语，又时而逐流；历史的回声被现代性狂欢阻断，后现代的晨钟又以回声的方式震动历史；全球化进程把大洋彼岸的季风带入焦渴的理论荒丛，民族特色的寻觅又使那季风转化为本土的春潮……这样的描述性话语并非表述激越的诗意，它只是文学与文论状况的诗意表达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表述中，一个理论追问再次袭来——它们何以会如此？

这一切，都须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中求解。

毋庸讳言，当下，中国正经历着声势浩大的社会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很多方面，包括无数的生活的枝梢末节，也都在潜移默化地变化。人们身在其中，因变而变，随变而变。当随着时光推演这样一步步地在变中前行时，人们只觉得每一步都和前一步不同，却感觉不出一个巨大变化

的轨迹。然而，经过三十年步步前行，回首走过的路，才深刻地感受到这是怎样的一段陡转崎岖的路，又是怎样的一段意义重大的历史。而这一代人又正是这一段路这一段历史的参与者、思考者、创造者。这使从事学术研究的我们感到有责任记述这一段历史，求解这一段历史，阐释这一段历史。其目的不是留下我们的思考——任何时代任何人都有思考，却未必都是有价值的思考，而是留下这段思考的历史，是思考着的这段社会转型期的历史。

社会转型引发的社会变革，当然也可以说，社会变革带来的社会转型，其牵动无所不在。社会转型就其深层根据而言，是既有社会控制、协调、管理的体制及支撑着这一体制，使之成为这样的体制而不是另一种样式的体制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系统性的动因间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在这一矛盾体中，由于后者是一种历史性的物质力量，是基础性的、发动性的、无可阻挡的力量，因此它具有充分的实现性，而此前它所支撑的社会体制，则是使其实现或阻碍其实现的被实现或不被实现（被否定）的条件性存在，即是说，社会体制相对于社会的原生动力而言，前者是后者得以实现的条件。这种关系，用经典的说法，便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经典的说法是更具概括性的说法。当体制的条件状况在总体上成为社会原生动力或物质性力量的压抑条件状况或否定条件状况时，前者的总体性的改变就无可避免。这时，任何局部修补都无济于事，整体性的体制调整，便成为社会转型的基础性需求。而顺应这种原发性物质力量需求向既有社会体制发起变革性思考及运作的人，便是社会变革的先行者，这样的先行者见于代表性思想，便是启蒙家，见于代表性行为表现，便是改革家，见于政治发动，便是社会转型的领导者。时下中国正进行着的社会转型，便是应社会发展的原生动力的需求，由国家决策部门所政治地发动的，由启蒙的思想家们所精神地或意识形态地阐发的，由众多领域的改革者所实践的历史与时代在矛盾中不断融合的多元化转型。

随着社会体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变革而相继发生的，是社会结构的变革，这一变革是既有社会体制向各社会领域延伸的细化结构的解

构，同时也是在体制改革带动下的新的社会结构的建构。这样的解构与建构过程因其细化而成为人们切身于其中的过程，每个人都被带入其中并且其中成为过程的构成者，每个人又在过程的构入中成为具体的实践者。这是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的运作者，大家在实践理性的运作中，变更着先前的行为模式，松解着先前的行为系统，大家又在行为系统的变动中与规定着实践行为取向的社会价值体系相遇，与新构着的行为模式相遇，同时，也与因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而引起的变化了的社会关系相遇。这些在社会体制与结构的变革中与每一个人相遇的外部力量，或每一个人都在其中的外部构成性力量，经由实践内化为人们的相应于社会转型的思想意识，人们对眼下发生的一切，据此而思考、而判断、而评价、而言说议论。思想家们在思想上启动这一过程，又凝敛与提升这一过程，由此形成着社会转型期的思想理论。

这套“社会转型与文学研究丛书”的出版，是国家教育部十一五“211工程”学术立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学与文论”研究的标志性成果的集结。该项目从文学与文艺理论的角度进入社会转型期的思想理论建构与系统阐释。像其他思想理论领域一样，文学及文论的理论思考也是一个历史的前承后继的过程。当然，思想理论的前承后继并不是线型延续的过程。由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提出并示范式地运用的谱系学方法，在后来者的进一步发挥与阐发中，已成为一套有很大学术沿用价值的方法论，这种价值来源于它合于历史的发展状况，并因此成为开启与思考历史过程的根据。谱系学的一个重要看法，就是认为历史的延续性不是连续的、绵延的，而是断裂的、跳跃的，历史的延续性是实现于具有某些基本相似点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跳跃式回放、复制与基本相似点的递变中。如先秦时期的社会转型、初唐时期的社会转型均引发了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问题便是个人与他人与家国社会的关系，两次转型的发力点与着力点都与这个问题密切关联，并且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延续性——人的个体能动性被强烈地激活、肯定，人的被禁锢的思想得以自由释放，不过这种被激活被释放的个性自由却没有像西方文艺复兴那样，

转入以平等为自由尺度的独立的个性发展与张扬，而是被导入复杂的人伦之中，强化着家国共体的人伦秩序。由既有人伦基点出发经社会实践转入个性激发，再将这激发的个性能量回落于进一步建构的人伦秩序，从先秦至初唐的两次社会转型跨越数百年的历史断带，实现着社会的基点性延续。

基于这样的历史延续性的理解，本选题把先秦至今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转型作为关注与学术取向的要点，把不同社会转型期的文学与文学状况作为研究对象，提示社会转型与文学与文论的内在联系，这样，文学与文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基本范畴，如诗言志问题、诗的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问题、诗的情感本体性问题、诗法及技巧问题以及诗的乡土母题、人生序位母题、生命体悟母题、爱情母题等，都跳出就这类问题去思考求解这类问题的传统研究方法，而是将之放入各自所属的社会转型时期，深入到社会转型的体制、结构、行为系统、思想意识层面，抓住期间的历史批判力量，不同社会层面的结构系统与行为系统的演进过程及演进形态，梳理并阐释与相应的历史批判力量、系统演进过程及其形态相应的思想意识，揭示这些社会因素是如何以其转型变化影响文学与文论，形成既有文学与文论的批判与解构，并进行新的文学与文论的提升与建构的。

文学及文论，有自己的系统性，有自己的内在规定性，也有自己的演进变化规律，深入进去，进行文学与文论的自身研究，这是此前经常被用到的研究方式，亦即向文学及文论本体内敛的研究方式。然而，文学及文论的自律同时又是他律的，而且是他律的自律，它总是被规定的，规定它们的是它们在其中的更大的社会文化系统，后者是它们得以如此的条件，是它们被特征化的语境。这种情况决定着文学与文论的任何状况的出现，任何命题、判断及范畴的形成与提出，都需要在更大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寻求动因与根据，这不仅是方法问题，这更是原本如此的规定。既然如此，与本体内敛的研究方式相对应，就必须向着社会文化系统进行外延式研究，使文学及文论问题，在其由社会文化系统所织就的周边网络中得到构成性研究，并由此揭示其何以如此是何以如此为的根据。本套系统著

作，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把文学与文论的各种基本问题及焦点性问题，放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转型的条件性背景中予以求解。这样，文学及文论与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社会行为系统、社会思想意识的关系便得以还原，便走出了传统的偏重于文学及文论的封闭的、孤立的研究状况，具体化着有机整体的、动态的、互动生成的研究方法。

还须指出的是，本套系统专著，在其研究与著述中，有意识地强调其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立足点，从当下的时代现实出发，坚持问题意识，确认在当下社会变革中文学与文论所面临的难点与焦点问题，在社会转型的不同历史阶段中，通过向着当时的社会文化系统，在本体内敛式研究的同时，努力开阔视野，进行条件性与语境性的外延式研究，以此求得文学与文论的历史问题的时代解答；同时，又把这一解答置入相应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去，形成历史与当今时代的互生互动。就拿全球化进程来说，这是具有当下特征的社会进程，它本身就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代表性体现。对于这一进程的学术投入，便使得文学与文论的既有的各种问题都获得更为广阔的背景参照，而在这样的背景参照下，既有问题便发生了视角、意义、侧重点以及提出问题的方式的变化。比如传统的意境问题，此前所进行的多是其意蕴考据及破解性的研究，而在全球化视野中，与西方的逻辑思维方式相比，它成为具有中国文学与文论的传统特色乃至根基特色的问题，它充分地体现着中国传统所特有的、有机整体的、浑融的、流动变化的、互动互生的思维方式及表述方式，于是，意境这一传统问题，便在当下时代高度上从文化根基与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角度被强调地提出。

本套系统专著的标志性成果见于十个方面，这十个方面，勾勒出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同历史时期文学与文论的代表性问题。这十个方面即：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文论建构、当代社会转型中的文学理论热点问题，西论中化与中国文论主体性、中国文论与文学的现代性、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及传播形态、中国现代时期的文论建构、历史变革中的文学经典研究、历史转型期的文体演进、春秋转型期孔子的礼乐思

想与文学观。这十个方面，均抓住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均突出文学与文论与其社会文化语境的关联性并将之作为思考的要点，均在社会文化语境与文学及文论的历史关联性中确定有历史代表性的文学与文论命题，并且均在社会转型的历史与现时语境中对这些命题予以论证和求解。这里涉及史论兼用的问题、社会文化的历史追问问题、文学与文论的理论基点问题、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学与文论的特色开掘问题、文学及文论传统的当下转换问题、文学及文论的现代性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当下文学与文论建构的焦点问题，每一步思路展开都富于挑战性与开拓性，每一部成果的产生都显现着中国学人的学术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都验证着建构中国文学与文论的学术功底与智慧。

前言

作为一个不容否定的重要事实，即西方思想理论对中国思想理论界及中国不同生活实践领域的变革性影响，自19世纪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中，中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变化又始终与西方思想理论的影响密切相关。中国文艺理论作为中国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百多年中发生了一个由传统文论向现当代文论的重要转型，在这一理论转型中，西方文论及相关思想理论的作用是关键性的。这一接受西方思想理论影响从而使中国自己的思想理论得以转型、完善及发展的历史事实引发了一个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课题，即对于西论中化过程的内在机制的理论研讨。这一理论研讨其实是一个伴随性的历史过程，即是说，它不是起自今日，而是伴随西方理论传入并影响中国思想理论建构不断发生的理论探讨与争辩。作为伴随性历史过程，西论中化的理论研讨同样成为一个重要事实。

西论中化的核心问题是“化”。对此，本课题在第一章专设一节，即“西论中化的核心问题——‘化’”加以阐释。倘若没有“化”，就没有西论对中论的影响，也就没有随之发生的理论转型与理论建构。“化”绝不是简单植入，也不是照搬套用，异域文化之间的思想理论交流也不可能由简单植入、照搬套用而取得成功——这成功当然是指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及文学实践确有指导性实效的思想理论的产生——的可能。这是因为从思想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角度说，这都不是思想理论自身运作的结果。马克思所批判的以自生的体系严谨性而扬扬自得的经院哲学，它们所以会在充满活

力的历史实践中陷入穷途末路，就在于这些经院哲学的建构者与迷恋者们轻信了思想理论自身运作这个神话，在自己设计的逻辑陷阱中不得脱身。而且，即便是后来被称为经院哲学的那些思想理论，在它们发生时，也并不是概念在所谓逻辑环节中的单性繁殖，而同样是所属文化母体的产物。文化在其历史延续与现实发展中通过社会实践而孕育思想理论，概念是被孕育的思想的理论符号或理论能指，它们并非先于思想而在——这是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也不是思想形成后在表述时的附加，概念在思想中获得生命，思想在概念中获得形态，二者共生共在。至于逻辑，它不过就是文化历史实践通往思想理论的路途，在这路途上行走着的是正在生成的思想理论，经由这段逻辑的路途，思想理论得以生成，随之这路途也便转化为思想理论的内在结构或理论框架。沃尔夫冈·伊瑟尔在阐释理论的构造时曾谈过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各派理论都根据各自所要达到的目标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艺术作品，所得出的结构性要素自然也多种多样，这些要素在每一派理论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我们所能见到的就是一系列建构性和操作性的理论模式。如果理论框架是建构性的，则它实质上是加诸于作品之上的一组坐标体系（grid）以对其进行认识；如果它是操作性的，则是为了解释事物的生成过程而构造一套网络结构”^①。伊瑟尔这里讲的作品、事物，都是在强调着理论的文化依附，而他讲的两种理论形态，建构性的与操作性的，都不过是对文化的不同揭示或把握。

思想理论是文化的精神提炼形态，该如何提炼、该提炼什么，这涉及哪些问题可以引起理论关注并因此成为重点理论问题，没有若干理论问题的重点突出，也就没有理论建构及展开，思想理论只能是问题式的。而哪些问题成为理论问题，换句话说，思想理论在哪些问题上对它在其中的文化进行提炼，这也不是理论自身可以解决的，思想理论是思想理论研究者的问题式运作，思想理论的问题式研究是研究者对于他在其中的文化状况

① 沃尔夫冈·伊瑟尔：《怎样做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197页。

包括历史状况理解的产物，这也就是说，思想理论研究者并不是根据理论而提出思想理论研究的问题，这类问题是来于他在其中的文化状况，是文化状况包括历史状况提出要求他予以理论解答的问题，进而他才对此进行理论解答。即便有些问题看似理论自身的问题，如某些问题的研究尚不充分，某些问题的求解尚不严谨，某些问题的求解有着明显的理论疏漏或逻辑混乱，等等，但这些问题究其实，仍然是文化状况的问题，是文化状况作为一种实践力量，检验着理论的问题研究，通过作用于思想理论研究者而补充、深化、强化、纠正那些理论问题，即便是某种逻辑纠正，其总体性参照也是在一定文化状况中的思想理论研究者对应于文化结构的思想结构或思维形式。中国古代哲学家思考问题的思想逻辑不同于西方古代哲学家思考问题的逻辑。这差异性的由来不在于思维本身，而在于他们各自生存其中的文化状况，包括历史状况。美国哲学家怀特海在研究理论体系及逻辑问题时指出，即使是逻辑本身，也在与体现在形式论据中的发现作斗争，因为这些发现超越了被逻辑限定的概念，而指向概念之外的更为广阔的领域，因此怀特海说绝不应从建立体系开始，而应从广泛的“收集”（*assemblage*）开始。他以威廉·詹姆士为例，说他的才智是以关于过去的东西的学识为基础，但他的更伟大之处在于他对于当代观念的敏感，这敏感性来自于他通过旅行，与世界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他自己所做的多种多样的研究而了解的他所生活的世界，所以，“他的理智生活的特点就是反对为了体系而忽视经验。他通过直觉发现了现代逻辑现在正在仔细研究的伟大真理”^①。

以上阐释的目的在于指出任何思想理论都是思想理论研究者从他们所生活的现实文化状况包括历史状况中所发现与提炼的精神形态，它们被提炼而成为思想理论，便必然是它们所属的文化母体的思想理论。

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瑞恰兹对思想理论与文化母体、与它所属现实生活及传统的关系进行研究，提出著名的语境理论。语境理论的核心观点便

① 怀特海：《思维方式》，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5页。

是思想理论、现实批评，都不是孤立的精神现象，它们与它们所属其中的文化母体，既具有纵向的历时性的上下文关系，亦即传统与现实相延续的关系，又具有横向的亦即共时性的“与我们诠释某个词有关的某个时期中的一切事情”的关系，而这横向的共时性的众多事件，又不过是历时性的一组同时复现的事件。瑞恰兹从思想理论的感性发生角度阐释这个问题，他分析说：“……我们有知觉、有反应，它的特性不仅有它的现实原因，而且还有它的历史原因。知觉从来不是对个别的、孤立的事物而言；知觉把它所感知到的任何事物都看做某类事物中的一例。所有的思维，从最低级的思维直至最高级的思维，不管它的发展程度如何，都是对事物进行分类的结果。”^① 瑞恰兹从知觉及思维角度揭示了一个道理，即人们的任何感受及由此发生的思维活动都不是对于对象的孤立的接受或思考，不管人们自己是否自觉或承认这一点，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他们必然要把这具体的接受归入到它可以划入的某一“类”中，这种归“类”就是归入先前经验，同时也归入先前经验的现实状况，“类”关涉到所能积累的全部先前经验，也关涉到能使先前经验在现实中活跃的各种现实事件，而概念就是这种“类”的文字表述，“语境”在“类”及其概念的运用中发挥作用。应该说，瑞恰兹的语境论对于理解文化母体的历史状况及其现实活跃状况对于思想理论生成的规定性，很有启发意义。

出于以上思路，可以确认的是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有它的文化归属，都是它所属文化的生成物，都打着它文化母体的烙印。

本课题研究就是从这样的思路出发，从理论上论证何以在西方文化母体中产生的思想理论不可能被中国文化母体产生的思想理论直接植入或照搬套用，而必须经过一个“化”的过程。

本课题涉及的第二个理论问题，即西论中化的“化”的机制。本课题在不同章节的论述及过程描述中，围绕三个基本途径展开。这三个基本途

^① 瑞恰兹：《论述的目的和语境的种类》，见赵毅衡选编《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31页。

径在这里予以概括，即阐释性接受、问题式求解以及批评。

阐释性接受，不见得就一定要写文章对某位西方学者的思想观点进行阐释。当然，这种文章形态的阐释大量存在着，对某位有影响的学者的思想理论进行阐释，这要涉及这类作家的若干代表作，属于综述式，这常常可以写成专著，如对尼采、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等，都有中国学者所作的综合阐释的专著；也有对某部西学专著的阐释，常见的有专著形式，也有论文形式；还有就是概述性的，把一个思想流派拿过来或者把一种理论体系拿过来，进行阐释，如阐释学体系、接受学体系、叙述学体系、符号学体系等，这类专著不在少数，论文也多见。而更常见的阐释方式，则是阅读阐释，无论是做卡片作笔记，还是做阅读批注，当下，国内的绝大多数学者都在不断地精读、通读、涉猎西方理论著作，文论界学者阅读西论著作已远远超越文论领域。他们阅读、思考，未必就所读著作写专著或文章，更多的是用于自己问题的研究。不管是专著专文阐释，还是阅读式阐释，阐释本身就是在“化”。

按照阐释学的基本理论，阐释的内容必然要溢出所阐释的文本之外。阐释的前提是理解，没有理解，则阅读不可能进行，或者说，阅读即理解。不过，任何理解又都是基本阅读者既往经验的理解，这既往经验，既有阅读者的生活经验，又有阅读者的阅读经验，他阅读的每一次经验，都成为他下一次阅读理解的根据。还有，就是阅读者所接受的传统影响。毫无疑问，任何阅读者都是在现时阅读中骤然成为阅读者，他总是他所接受的传统的现时承接者，他本身就实现着传统的延续，他是传统延续的我的体现——尽管这传统延续因自我状况而在不同的延续者身上各有差异，但不同的差异性自我中却延续着传统中普遍性的东西，传统因此得以延续。因此，任何阅读理解，不管阅读者是否自觉，在他的理解中都实际地运用着几个方面的规定性，它包括既往生活经验、知识及理论求解经验的规定性，现实生活中各方面事件的现时规定性，当下对于阅读者最有影响的现实情境的规定性，再有，就是传统在个性承继中所保留的传统普遍性的规定性。经由这样一番多元规定，本文的理解，就肯定不是文本写作时写作

者的理解规定性，也不是后来阅读者对于文本自身的理解规定性。现时的文本理解，永远是阅读者基于传统与现实生活经验，还有现实生活情境及现实理论研究情境的综合规定的理解。而文本所体现的文本写作者对于文本的自身理解，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可供现时阅读者理解攀援的线索，没有这个线索，就无所谓攀援，但仅是这个线索，也就没有攀援中的种种努力，以及攀援中随时映入眼帘的迷人风光。显然，这样的阅读理解，是以阅读理解者为主体的，即是说，他所阅读的，不是文本自身，而是他对于文本的理解；而他所理解的，同样不是文本的自身，而是他被文本所激活的他的综合规定性。

这样说，并不否认对于文本内容的普遍性理解，文本所提供的内容肯定具有可供理解的普遍性，不然，也就不会有文本的思想理论的延续性，那样的话，文本就成为易拉罐似的一次性消费，消费过后，易拉罐的残骸依然存在，却再没有先前的可用价值。有思想理论价值的文本不是这样，它总是有普遍性的东西在不同的文本阅读中延续，不过，这延续的普遍性，在不同阅读的理解中成为各有差异的具体普遍性。具体普遍性这一说法的首用者是新批评派被称为最博学的批评家的威廉·K. 维姆萨特，他的这一提法一经抛出便引起热烈争论，争论的焦点还是那个普遍理解的多样化问题。按照维姆萨特的看法，同一文本的不同阅读理解，并不会抛弃文本自身内容的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在不同的阅读理解中因为具体性而差异化，这种具体的差异化，体现着文本理解的普遍性。为此，维姆萨特在对比古典的经院的阅读理解与现代实证的、唯名的语义的系统理解差异性时指出：古典的经院系统所强调的，是同一项所指称的个体之间的相似点，从而强调意义的真实共相，而现代系统强调个体之间的差异，强调甚至同一个体在时间与空间中的流变与其动力性结构，由此推导出意义的近似的、名称上的共性，推导出使用一般项只能求其方便，而不能求其真

理。^① 维姆萨特发现并求解了一个阐释学的重要问题，即差异性阅读理解及这样理解的普遍性问题，其结论在于，没有差异性理解，也没有普遍性接受。文本阐释的文化主体的差异性，在其接受的普遍性中得到了肯定。

再谈问题式求解。问题式求解，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所要求解问题从何而来，也就是说，这问题是谁的问题。相对于西论中化而言，中国学者从理论上提出问题，当然是他们生活其中的现实生活领域的问题，或者，是他们所在学科的问题，这类所在学科的问题，是这一学科在中国各方面情况综合作用下在学科活动及学科建设中表现出来的问题，这类问题具有确定的中国语境性。如本课题第四章谈到五四传统批判中的西论中化，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一体化阶段文论建构中的苏联中化情况时，都特别指出并论证，问题式求解是如何发挥“化”的机制性作用的。固然，同样的问题在其他国家或民族也可能会提出，但它们的根据、它们的求解要求与目的，以及对它们求解的各方面的关联性，都具有它们各自的国家或民族的语境规定。怀特海曾分析过各种问题以问题的方式被提出问题者注意到，都是因为这类问题对提问者显示出某种重要性。那么重要性从何而来呢？怀特海认为它来自于周围环境的客观规定性。他说：“环境在任何物理维度上都凌驾于我们之上。因此实事带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重要性的提出，“是对我们其他基于一切类型的事物都淹没于其中的自然界的事态的态度。它起源于作为过程的我们自己的思维之中，而这种过程又淹没于我自己之外的过程中”^②。在这样一种与外部环境的联系中，重要性的问题才得以向这一联系中的提问者显示出来。因此，环境的给定性，从瑞恰兹角度说，语境给定性，对于问题的提出具有决定性作用。

而问题的求解总是具有目的性的。不同求解者从他的给定的周围环境或语境中发现问题的的重要性时便连同确认了求解问题的目的，即是说，问题重要性本身就包含着目的，它指向目的，并因这目的指向而显得重要。

① 威廉·K·维姆萨特：《具体普遍性》，赵毅衡主编《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

② 怀特海：《思维方式》，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9页。